

朱谦之的马克思主义之路*

殷飞飞

【提要】 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是一个寓研究于批评、由表层达肌理的过程。五四时期,朱谦之虽立足于无政府主义批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但重视工农群众及坚持大同共产主义,构成他与马克思主义大致同调的革命基础。留日归来,他以生命哲学立场解析唯物辩证法,对辩证法批判性、革命性本质的认同,成为其与马克思主义肌理相通的学术因子。经历抗战救国的社会文化实践,朱谦之厘清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唯物史观汲取更多的思想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话语在体制化、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改造中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批评与研究”的学术互动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是朱谦之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驱力。

【关键词】 朱谦之 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 批评与研究

朱谦之是20世纪知识分子谱系中深具个性的学人,其著述广博多元,被经济学家王亚南称为“百科全书家”,^①被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誉为与梁启超、胡适、梁漱溟并列的“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②学界关于朱谦之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以专题研究为主,综合研究为辅。前者着眼于朱氏在哲学、历史文化及宗教学方面的学术成就,^③后者力图呈现其一生的学术创获及思想特色。^④关于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目前学界尚缺专文予以详论。一些相关研究,如许冠三认为,20世纪30年代,虽然朱谦之携生命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立”,但与20世纪20年代的“极端否定”迥异。^⑤赵庆云指出,朱谦之“虽然强调史学研究中‘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似与唯物史观针锋相对,但细究起来,他的史学理论建构非但无法绕越唯物史观的存在,且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重要参照,从唯物史观中获取思想资源”。^⑥这些观点对笔者进一步探讨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的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史学’派与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演进”(项目编号:21CZS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03页。

②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太平洋》第4卷第1期,1923年。

③ 哲学方面有董德福的《朱谦之哲学思想梳要》(《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曹树明的《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程潮的《朱谦之历史哲学探索的心路历程》(《广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历史文化方面,如周文玖的《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刘林睿的《朱谦之文化思想与南方文化运动》(《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陈永霞的《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宗教学方面,如黄心川的《朱谦之与〈中国景教〉》(《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成建华的《朱谦之与东方哲学及宗教学的构建和发展》(《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

④ 例如,张国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五四奇人朱谦之的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黄夏年:《朱谦之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

⑤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8页。

⑥ 赵庆云:《略论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建构》,《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关系有很大启发。

民国时期,朱谦之宣扬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生命哲学,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批驳甚多。他称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批评的人,认为:“‘批评’和‘研究’是非常有关系的,批评中有研究的工夫,研究中有批评的态度,往往打成一片,所以很难分别。”^①“批评与研究”实际构成了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种联动关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改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成功转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这一转变除了新生政权意识形态形塑,还有哪些因素成为朱谦之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驱力?“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的个案研究,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何启示?以上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一、革命论争:立足于无政府主义评议无产阶级革命

五四时期,传统道德信仰面临崩解,新的社会秩序尚未重建,虚无主义和怀疑情绪蔓延,域外的各种主义和思潮汹涌而至。青年学生为各种理论思潮吸引,其中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尤受追捧。^②朱谦之便是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因宣传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名声大噪,风头不亚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以及“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张国焘。^③他的虚无主义“于近世取黑格尔 Hegel 的绝对唯心论辩证法,和萧本华的厌世主义。于现代取柏格森 Bergson 的直觉主义, Ostward 的唯力论, 颌德 Kidd 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的无治主义”,最终归纳而成。其虚无主义的方法是“否定”和“破坏”,目的是要“消灭”而不是“变换”。消灭的对象是宇宙内的一切组织(不局限于国家和政府组织),即进行彻底的宇宙革命。^④

无政府主义革命是朱谦之实现“虚无”目的的手段。1920年1月,朱谦之与郭梦良、易家钺等人创办《奋斗》旬刊,宣传无政府主义。本着虚无主义思想,朱谦之比一般“互助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激进,主张取缔一切组织,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自由组织。^⑤在他看来,“无政府革命实现了,那末‘虚空破碎,大地平沉’这一大事,也就容易成功了”。^⑥可以说,朱谦之是一个虚无派无政府主义者,宇宙革命是其最终目的。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膜拜“革命”的时代。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朱谦之也注意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在强权之上,专制而不自由,如列宁主张“不用强迫手段,不用专政手段,便可以由资本主

①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新中国杂志出版社1920年版,第6页。

② 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21页。

④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第140、143、145、160页。

⑤ 朱谦之:《再评无政府共产主义(续)》,《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7日。

⑥ 朱谦之:《革命哲学》,泰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205页。

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是极其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①同时,他也肯定列宁、托洛茨基将从前认为是空想的阶级斗争实现了,广大劳动者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阶级斗争是解放无产者的“方便法门”。^②朱谦之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敢于挑战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其无产阶级革命是有价值的,可将其看作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一个过渡阶段。一方面,朱谦之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实即植于马格斯社会主义之上”。对于当时诸多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共产主义“尚差强人意”,但“马氏所谓共产乃中央集权之共产主义”则“根本错乱”。^③另一方面,朱谦之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相比于“求苟且生活,糊过眼前底日子的社会改良家,实在高出万倍”。而且,“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学说,在社会革命的原理原则上,多少总有个相同的基础”。^④在朱谦之看来,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

朱谦之不满布尔什维克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权”色彩,并借此批评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这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及共产主义学说的误解。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⑤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而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一种实践模式,并不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路径。例如,发表大量文章介绍俄国革命的张东荪认为,“俄国所行之无产者专制大背于马氏。”^⑥国内最早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先驱李大钊,虽然高度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但也并未完全认同列宁主义。

1920年10月,朱谦之因与无政府主义互助团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入狱。在狱中,他静思体认“真我”,潜心研究诸子学及佛学书籍,重新思考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他认为大部分主张革命的青年都羡慕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功,想利用暴力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的做法是危险的。他想从根本上改造人心而倾慕佛学。^⑦出狱后,朱谦之于1921年赴杭州西湖出家,因感受到佛门生活的虚伪,愤而离去。此后,他流连于沪、杭山水美景,感受宇宙自然之美,并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等浪漫主义文人,受到泛神论思想的熏陶。因此,他提出“唯情哲学”,认为宇宙万物无一不为“真情”所摄,宇宙的真相就是“真情之流”,“真情之流”完全是“自然的、泛神的、唯心的变化”。^⑧此时朱谦之的本体论转入生命一路,认为“情”是本有,从前自己以“无”作“情”看,主张虚无主义,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无’字并不是生命真相,生命是本有的,自己如此的。”^⑨他以“情”贯通儒家哲学思想,认为《易经》主要观点是讲“真情之流”的自然变化,孔子所谓的“仁”“礼”皆是“情”。^⑩朱谦之“唯情哲学”实际上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之流”与儒家哲学糅合到一起。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② 朱谦之:《劳动节的祝词》,《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③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第52—53页。

④ 朱谦之:《革命哲学》,第134页。

⑤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

⑥ 张东荪:《通讯·复鲁贻》,《时事新报》1920年5月1日。

⑦ 朱谦之:《回忆》,现代书局1928年版,第41页。

⑧ 朱谦之:《唯情哲学发端》,《民铎杂志》第3卷第3期,1922年3月。

⑨ 朱谦之:《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泰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52—53、70页。

⑩ 朱谦之:《唯情哲学发端》,《民铎杂志》第3卷第3期,1922年3月。

朱谦之主张从真情之本出发,试图通过“爱”与“和平革命”达到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金钱,没有买卖,并且没有什么资本家。”^①朱氏所谓的大同社会实际接近刘师复所说的,“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②朱谦之将大同主义理想寄托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和平的共产主义,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多有质疑。但他也认可,“共产党他们注重事实,注重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很可钦佩的。”^③朱谦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在废止阶级,而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强权,并且解放地球上一切人民而永远废止战争的大同世界”,与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殊途同归。^④他在1927年出版的《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两本论著曾一度因“宣传共产主义”,在成都市被查禁销毁。^⑤朱谦之憧憬的大同社会以孔子的理想为基调,以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本质,属于空想社会主义。^⑥或者说,其大同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投射。

1927年8月,朱谦之担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主讲“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提出“农工兵大联合”的口号。他同情工农群众,认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国民革命就会失去革命基础。朱谦之“农工兵大联合”的主张与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禁止民众运动的做法,^⑦无疑是相悖的。

无论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的虚无主义世界观、无政府主义革命,还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同主义理想、“三民主义”学说,朱谦之都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当作它们的对立面和参照物加以阐发和批评,但在对立、批驳中也对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群众运动持有同情与肯定,这些同情和认同构成了他与马克思主义大致同调的革命基础。

二、内核辨析:以生命哲学立场解析唯物辩证法

从批驳社会革命论到辨析唯物辩证法,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阐发大致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政治革命到哲学理论的引介过程和传播规律。早在20世纪20年代,朱谦之评议无产阶级专政,便开始以生命哲学立场批判唯物史观。他批评唯物史观“把物理的法则硬用到社会进化上去”,“只知历史法则却忘了意志自由”,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决定论”,鼓吹“历史发展中寻出一种最根本的原动力,就是欲望”。^⑧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朱谦之对唯物史观的关注远不如对马克思

① 朱谦之:《回忆》,第81页。

② 刘师复:《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1卷第1期,1913年8月。

③ 朱谦之:《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第1、4—5页。

④ 朱谦之:《到大同的路》,泰东图书局1929年版,第13页。

⑤ 《三军联合办事处查禁共产书籍一案文》,成都市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组编:《成都工人运动史资料》第3辑,1984年印,第415页。

⑥ 竹内弘行:《朱谦之的大同思想——关于朱谦之〈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的路〉三著作之初步考察》,陈玮芬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第1期。

⑦ 关于国民党“分共”后禁止群众运动,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5页。

⑧ 朱谦之:《革命哲学》,第139、141、143、151页。

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关注。他在1926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附录中“关于唯物史观及其批评”的书目约有十本,但其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附录显示,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论著共计一百多种,且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著述与译作,这一变化与朱谦之留学日本潜心研究历史哲学理论有很大关系。

1929年,朱谦之东渡日本。到日本后,他生活拮据,在熊十力等人的帮助下,经蔡元培同意,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身份获得资助,研究的课题是“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之比较”,旨在阐明民生史观并从经济方面批评唯物史观。^①据朱氏观察,当时日本思想界黑格尔主义研究盛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出风头的时候”,将来会更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的唯物辩证法革命思想。^②受此影响,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研究的重点也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转移到唯物辩证法。

1931年,朱谦之回国,短暂执教于暨南大学,从1932年开始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史学系,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对黑格尔辩证法尤感兴趣。此时,中国哲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辩证法的论战,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是论战的重要议题。朱谦之也加入了这场论争,详细研究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史论丛》等经典论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力图阐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学说,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剩余价值说,均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都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世界历史分为东方的世界、希腊及罗马的世界、日耳曼的世界,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期说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的《法的哲学》强调阶级的重要性,并将其划分为实质的阶级、反省的阶级和普遍的阶级,也给予马克思很大启发;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不能和辩证法分开,辩证法的源泉直接来自黑格尔。^③马克思主义者沈志远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唯物辩证法“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讲,都是黑格尔辩证法之直接的产物”。^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既有发扬,也有克服。朱谦之也强调了黑格尔观念论与马克思唯物论的本质区别,认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为唯物辩证法,是辩证法史上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⑤朱氏认为马克思这段话是“由观念辩证法变为唯物辩证法的一篇宣言”,“马克思能够很深刻地认识辩证法之革命的性质,尤其和我意见完全相合”。^⑥这表明朱谦之和马克思一样,都推崇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质。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一书以大量篇幅详细考释了唯物史观的发展史,逐一评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德波林等人在唯物史观哲学体系中的创见。他将唯物史观的发展史分为三

① 《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0年版,第304页。

② 朱谦之:《日本思想的三时期》,《现代学术》第1卷第3、4期合刊,1931年12月。

③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页。

④ 沈志远:《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第6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⑥ 朱谦之:《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03页。

期:第一期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理论之发展”,第二期是考茨基“科学的非辩证的理论之发展”,第三期是俄国列宁“辩证的革命理论之发展”。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但第二期的唯物史观已经不是第一期马克思本身的唯物史观,它将社会革命之统一的全体理论变为资产阶级之经济、教育、宗教、艺术、科学及其他文化的批评。“这些科学的批评,不消说不能走向革命的实践中,而一变为种种的改良运动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复活的,是俄国第三国际派的理论。“他们反对第二国际派将唯物史观变成抽象的及非辩证的实证科学之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之辩证法的统一,自然在唯物史观上,这一派可算是最彻底最出风头的时代了”。^①朱谦之对唯物史观发展史的论述系统而详实,被许冠三称赞“其提玄钩要之功,且常出公式派教条派马列主义者之上”。^②然而,朱谦之在唯物辩证法之上又安置了一个生命辩证法。

朱谦之认为,唯物辩证法乃至自然辩证法在德波林学派遭批判后受到重创,势必要自告结束。如果辩证法要别开新途,柏格森的直觉法给予我们很大启示。辩证法要联合生命哲学,只有生命辩证法才能说明浑融圆转、活泼流通、永不停歇的“真情之流”。^③生命辩证法不能完全排斥唯物辩证法,站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革命时期,为了实际需要必须联合唯物辩证法,从纵的方面用生命辩证法认识“永远的现在”,从横的方面以唯物辩证法把握“现实的现在”。只有把握现实所经过的发生、发达和没落的过程,我们才能改造周围的世界。^④朱谦之作为“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黑格尔的学者”,^⑤开启了中国辩证法研究的体系性建设。他借鉴孔德知识发展的三阶段法则,自创性地将辩证法发展史分为神学的辩证法、观念论的辩证法、唯物的辩证法和生命的辩证法四个阶段。^⑥对此,有学者认为,朱谦之将生命辩证法视为辩证法发展的最高阶段,置于唯物辩证法之上,这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误解。^⑦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并非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和延续,而是哲学发展史上的根本转变和空前革命。

与生命辩证法相呼应,朱谦之宣扬生命派历史哲学观,推崇孙中山是彻底的新生机主义者,认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全人类社会的进化观,对研究人类社会的生活、生存、生计、生命等方面进化都有意义。孙中山主张,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但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未见社会进化的原理,是一个社会病理家而非社会生理家。^⑧受孙中山民生主义及美国学者威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⑨一书的影响,朱谦之将唯物史观的进化解为“完全是由于物质变迁”,只解释了社会进化的结果而未说明原因,只见物质不见生命,只见经济不见生存,只见人类的一个阶级而不见

①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18—119页。

②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28页。

③ 朱谦之:《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第123页。

④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第169页。

⑤ 黄夏年:《朱谦之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

⑥ 朱谦之:《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第97—98页。

⑦ 董德福:《朱谦之哲学思想梳要》,《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⑧ 孙文:《三民主义》,民智书局1924年版,第19页。

⑨ Maurice William:《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社会主义研究社译,民智书局1927年版。

人民生活全体。^①事实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有很大的相近性,都重视物质生产、关心人民生活。朱谦之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立场下,弱化了民生史观蕴含的物质因素,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人的生存欲望和冲动,从而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极端、片面的解读。但是,朱谦之也注意到,社会病理是不能被否认的真实存在,不仅如此,还要运用辩证法去研究它的现象和法则。正如许冠三所说,虽然朱谦之携生命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立”,但与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极端否定”迥异。^②

“批评中有研究的功夫”,朱谦之深入探寻唯物辩证法源流,尤其肯定辩证法批判性、革命性的本质,这或许是其与马克思主义肌理相通的学术内核。难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说,“朱谦之先生听说也一时地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者。”^③

三、立场省思:社会体察与唯物史观新倾向

抗战时期是朱谦之个人思想与社会现实发生碰撞的重要节点,推动他再次由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正如王汎森所说,对时代处境的关怀以及史家的生活经验,能够帮助史家将手电筒照到一些原先忽略或视而不见的角落或层面。^④在抗战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朱谦之在社会文化实践中认识到艺术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重视经济因素与阶级分析法,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治学;自原子从科学角度被证明为事实后,其旧有的唯心主义观念受到冲击,世界观逐步发生转变。

为唤醒民众积极投身抗战救国,朱谦之发起音乐文学运动。他翔实论述了苏联文学运动史,仿照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内容”,提出中国现阶段的音乐文学应是“革命三民主义的内容”——现代化、中国化和平民化。^⑤相较于早年提出的充满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平民音乐和平民文学,^⑥此时朱谦之倡导的音乐文学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文化。或许基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共同立场,朱谦之一改之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态度,更多关注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者的共性。他指出,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谓“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着的”,“随着阶级底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灭”,与《礼运·大同》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相同的;战后世界将是美善和乐的大同世界,如列宁的共产社会、孙中山的大同社会,^⑦也就是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⑧

除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朱谦之倡导的平民音乐和平民文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①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第270页。

②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24页。

③ 艾思奇:《新哲学论集》,读者书房1939年版,第148页。

④ 王汎森:《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古今论衡》2011年第23期。

⑤ 朱谦之:《音乐文学运动》,丘陶常记录,《时代中国》第9卷第2、3期合刊,1944年。

⑥ 因唯情、唯美的取向,以及研习音乐的恋人杨没累的影响,朱谦之在五四时期就曾专注音乐文学,提倡平民文学、平民音乐。参见张国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五四奇人朱谦之评传》,第52页。

⑦ 朱谦之:《战后文化展望》,《新生路月刊》第11卷第2期,1946年5月。

⑧ 孙文:《民生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第1页。

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也大体合拍。^①他认识到各种形式的音乐文学如朗诵、歌曲、诗剧、歌剧等，“都是现实社会的产物”。^②他认为只有平民化的音乐才能成为唤起民众保家卫国的力量，因而积极提倡以农村为创作题材的“农村曲”，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群众路线为基石的进步文艺活动十分接近。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山大学文学院迁至广东梅县复课。朱谦之说：“在梅县以至回广州后，由于抗战的现实，我才渐渐踏上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第一步。”^③为欢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剧宣七队”到梅县演出，朱谦之专门作了新音乐文学运动的主题演讲，肯定《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新歌曲及平民歌剧，赞扬“剧宣七队”的新歌剧创作形式。1948年5月，在《五四精神》一文中，朱谦之宣称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国际革命的背景下，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④经历国共合作、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通过积极投身抗日文艺宣传的进步活动，朱谦之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疏离到靠近，由怀疑到肯定。

在组织各项进步文化活动的社会实践中，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邀请茅盾为中山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演讲《民主与文艺》。茅盾在演讲中强调，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并根据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系统阐释了不同时期各种文艺的不同表现形式，呼吁将文艺运动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⑤哲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从认识论角度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朱谦之在1946年初发起“新读书运动”，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革命学问”，号召以孙中山和列宁为榜样将读书与救国相结合，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⑥这些带有“左倾”性质的文化运动使朱谦之处境日益危险。黄紫琇和丘陶常等中山大学同事叮嘱朱谦之：广东省当局认为朱谦之思想左倾，“须十分谨慎，不要再有什么活动了”。^⑦

随着在社会文化实践中自觉向历史唯物主义靠拢，朱谦之的学理思想也逐步发生改变，与唯物史观相向而行。1944年由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一书，是朱谦之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该书参考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两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具有深厚的反帝反封建色彩的农民革命，是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朱谦之将经济因素视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首要原因，认为这是一场由农民发起的土地革命，以贫农和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为阶级基础，最迫切解决的是土地问题。朱氏还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分析问题，认为太平天国和湘楚各军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前者代表贫农而后者代表地主或至少是富农，就此而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这场革命。

在朱谦之学理思想转变的同时，其原有的哲学立场也在发生动摇。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

① 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

② 朱谦之：《音乐文学运动》，丘陶常记录，《时代中国》第9卷第2、3期合刊，1944年。

③ 朱谦之：《中大二十年》，《朱谦之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④ 朱谦之：《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00—101页。

⑤ 茅盾：《民主与文艺》，易汉文主编：《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页。

⑥ 朱谦之：《发起新读书运动》，关履权记录，《海滨》第1期复刊号，1948年6月。

⑦ 朱谦之：《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96页。

掷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威力给生命论者朱谦之的很大震撼,使他意识到物质的客观存在及意识的相对渺小。^① 他开始搜集关于原子、原子能和原子弹的各种著述,包括美国政府关于原子弹研究与制作的全部报告。他逐渐相信原子之客观的物理存在,变成一名唯物论者。^② 在此之前,朱谦之一直是唯心论者,认为柏格森所说的“物”本就和生命之流浑融为一,由直觉看来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③

原子从科学角度被证明真实存在,动摇了朱谦之的唯心主义观念,即“物质”一词是其世界观转变的关键词。^④ 在虚无主义哲学预设下,朱谦之认为唯物史观使社会上一切关系均依附于物质条件,“把人类的精神努力,抑制在物质的境遇之下”。^⑤ 在“唯情哲学”时期,他意识到“我从前对物质生活,抱一种轻蔑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固然物质能诱惑人们,但它的弊端是暂时的。^⑥ 1927年,朱谦之与杨没累在杭州西湖的隐居生活几乎维持不下去,为了谋生,为着金钱,只得暂时与爱人分离,南下广州谋职。真实的个人生活体验使朱谦之意识到物质或经济基础的不可或缺,抗战等社会现实需要更进一步凸显了物资的重要性。朱谦之称,抗战时期是“经济时代”“军火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时代”,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需要更多的军火物资援助。^⑦ 朱谦之对“物质”客观实在的切身体察,是通过个体实践与社会历史互动而逐步加深的。

四、重获新生:外化立场与内生学理的双向塑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凝聚民众思想,适应社会转型及变革需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予中国民众对新社会、新制度、新文化巨大的希望。正是在这种希望的感召下,大多数知识分子积极配合思想改造,自觉加快跟进的脚步。朱谦之认为,“最对我起根本变化的是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运动。”^⑧ 经过思想改造,他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新思想,检讨旧有的思想立场,成功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⑨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山大学全校师生的日课。作为哲学系主任的朱谦之不仅学习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与一部分先进分子组织“新民主主义学习会”,集体讨论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新民主主义理论纲领。他对“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讨论最有感触,这与其一贯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最

① 张国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五四奇人朱谦之评传》,第126页。

② 朱谦之:《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92页。

③ 朱谦之:《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第76页。

④ 关于朱谦之的“物质”认知及其态度变化,参见海青:《从朱谦之的“自杀”看其自我哲学的演进》,《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

⑤ 朱谦之:《革命哲学》,第133、138页。

⑥ 朱谦之、杨没累:《荷心:爱情书信集》,新中国丛书社1924年版,第59页。

⑦ 朱谦之:《什么是现代》,黄庆华记录,《现代史学》第4卷第3期,1941年8月。

⑧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77页。

⑨ 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指学理思想和政治认同两个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服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等,政治上认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

为贴近,如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革命哲学》一书强调群众对革命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倡平民化的音乐文学运动、国民革命时期呼吁“农工兵大联合”、“现代史学”运动中提出“人类历史乃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抗战时期组织平民化的进步文化活动……朱谦之历来的思想主张和实践,都充满对底层民众的关切与肯定。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除劳动观、群众观以外,关键是阶级观点,而阶级观点规定了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内容。^①朱谦之自述,从学习批评《武训传》开始,他才认识到学术文化与社会实践都是有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有着根本不同。譬如,孙中山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美国威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一书,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俄为师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孙中山宣称以马克思精神为骨干,但转而提出“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的否定。究其原因,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阶级立场不同使然,孙中山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③

对朱谦之哲学立场的转变而言,“最得力的是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④1951年,他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阐释“实践论”,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对柏格森生命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识到生命是物质的,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柏格森从直觉出发的生命哲学不是科学的哲学。马列主义辩证认识论的生命观主张生命与现实、实践及客观真理相统一,是科学的哲学。^⑤后来,朱谦之调往北京大学,为哲学系学生授课时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而孔德的感性哲学与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均做不到,他们最终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践的历史哲学所替代和推翻。^⑥朱谦之历来重视实践,早年倡导的生命哲学就有改造世界的目的,抗战时期也十分关照社会现实,强调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继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性也构成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学理相通的重要内核。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朱谦之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致力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东方哲学及宗教学问题。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其《中国哲学史提纲》一书勾勒了从春秋到清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发展史。他以马克思社会发展分期说为蓝本,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依照各时代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阶段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发展”。^⑦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早期尝试。

关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提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⑧这是当时学界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念的首次界定。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在1957

① 陈峰、董彩云:《“革命学术”与“学术革命”:共和国初期人文学术转型的双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② 孙文:《民生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第14、19页。

③ 朱谦之:《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论底新发展》,《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669页。

④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77页。

⑤ 朱谦之:《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论底新发展》,《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685页。

⑥ 朱谦之:《黑格尔与孔德的历史哲学》,《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141页。

⑦ 朱谦之:《中国哲学史提纲》,《朱谦之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 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文集》第4卷,第183页。

年就刊行油印本,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理论基调,综合阐释从商朝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更早问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领域有开创性贡献。^①

除了中国哲学史,其他专题史领域如东方哲学史、中西方宗教学史,朱谦之也运用唯物史观开辟出一条研究新路。其东方哲学史成就以日本哲学史最具代表性,他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着手,剖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发展流变过程,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对日本哲学产生的影响。关于中西方宗教史,朱谦之的景教研究具有拓荒之功。前人多从事考证、考古工作,朱氏则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揭示中国景教的变迁与兴衰,尤其注重从经济原因入手分析景教产生的条件及衰亡的缘由。^②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想盛行,滋长了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③ 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学习转向证明其成为新派学人的政治立场,因此急于将新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迅速应用到治学实践中,但在将书本理论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往往因缺乏经验而极易出现教条主义弊病。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受苏联影响很大,在哲学方面往往以苏共中央日丹诺夫范式为准绳,“斗争史观”(即认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和“目的论史观”(即认为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盛行。^④ 例如,朱谦之所称“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⑤明显受日丹诺夫“目的论史观”影响。他所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必然地以环绕历史上的五种生产关系而规定其史料的实质”,^⑥也是依据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得出的结论。

1959年,朱谦之检讨、批判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他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确实起到反帝反封建的先导作用,许多共产党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也曾有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相比于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无领导行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必须把自身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走到颓唐、消沉和没落的路上去。^⑦ 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无政府主义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核心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反对一切组织制度和强权,幻想推翻资产阶级后可以一步跨入无政府社会。^⑧ 无政府主义虽包含着谬误和空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力图构想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案。^⑨ 对朱谦之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想不能简单否定,而应将之视为朱谦之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① 曹树明:《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

② 张国义:《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再生——五四奇人朱谦之评传》,第140—177页。

③ 所谓“教条主义”,指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等同阶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片面主张史学为政治服务。参见周文玖:《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思潮的认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④ 乔清举:《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⑤ 朱谦之:《中国哲学史提纲》,《朱谦之文集》第4卷,第3页。

⑥ 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文集》第4卷,第186页。

⑦ 朱谦之:《无政府主义批判——“五四”四十周年纪念》,《朱谦之文集》第1卷,第269—270页。

⑧ 胡庆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⑨ 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导言”,第2—3页。

结 语

朱谦之的学术主张与政治立场双轨并行又彼此关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朱谦之的哲学思想经历了虚无主义向“唯情哲学”的转变,而生命哲学贯穿始终;与哲学思想演变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也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大同共产主义,但大同理想始终带有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谦之转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思想改造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短时间内将新思想应用于实践更加困难。虽然大部分旧派学人主观上有接受改造的意愿,但现实中往往会遭遇各种困境与羁绊。这些从旧中国迈向新社会的五四学人,如果学理上不认可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转型可能只是表面的或暂时的,很难从思想上彻底蜕变,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左右为难、无法自洽。因此,新政权意识形态形塑之外的因素,如内驱力,或许是旧派学人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就朱谦之而言,早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研究”,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恰是促成他日后成功转型的重要内在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交锋中,寓研究于批评,“真理愈批评而愈明白”。^① 20世纪20年代,他立足于无政府主义阵营批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寄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农工兵大联合”的主张及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却又奠定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革命基调。20世纪30年代,他虽以生命哲学否定唯物论,但对辩证法批判性、革命性内核的认同又成为他与马克思主义肌理相通的学理内核。20世纪40年代,投身抗战救国进步文艺活动时,他开始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20世纪50年代,他通过集中改造学习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品格,最终进入马克思主义阵营。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再次表明,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革命性与实践性最终经得起学理推敲与实践检验。

(作者殷飞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朱谦之:《现代思潮批评》,第2页。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a hypothesis proposed by his teacher Natio Konan, one that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Miyazaki Ichisada followed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pproach originated in Europe,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ancient, the medieval, and the modern times, and he argued that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s. In this case, the two main core arguments held by Miyazaki Ichisada are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 However,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regarded all “under the heaven” as the ruling area on their own ter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erritory” in modern states. The principl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Great Unific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erritorial unification. Hence, the invasion of territory in modern times cannot prove the “progressive nature” and “leadership” of ancient dynasties. Moreover, the ancient Chinese perspective of “Yi” and “Xia” was in direct contrast to nationalism in modern times. Miyazaki Ichisada exaggerated antithesis between the “Yi” and “Xia”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deemed it as just cause for military conflicts, whose goal, as revealed, was to justify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Zhu Qianzhi’s Road to Marxism // Yin Feifei

Anarchist Zhu Qianzhi’s road to Marxism was a process of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 and peeling of the layers to discover the truth.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u criticized Marx’s theory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rom an anarchist perspective. Yet he emphasiz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adhered to the communism of great harmony, which was in tune with the basic ideas in Marxist revolut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studying in Japan, he analyz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of life,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dialectics became an academic linkage that connected him with Marxism. Through social and cultural pursuit of saving the n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developed a clear vision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rew mor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deological discours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wever, it is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iticism and research”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that served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Zhu Qianzhi to embrace Marxism ultimately.

Hu Qiaomu’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Wri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in the Age of Opening-up and Reform // Zhang Lianyo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u Qiaomu offered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significant issues in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He argued that, based on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writing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should serv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become a theoretical weapon for ideological struggle. He argued that one should embrace scientific views and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scientifically interpreting various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He also called a return from the vivid and rich style in writing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Party History. He believed that historical narratives could not offer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Party History. Only by clarifying its dominant themes, exhibiting its significant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within macro narratives, and re-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that were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could the writing of Party History return to its original course.